

# 中国现代小说 人格塑造高峰的断裂<sup>※</sup>



——以鲁迅为何停止小说创作为例

◎ 毛克强 袁 平

**【摘 要】** 鲁迅曾以小说为武器，尖锐地抨击国民的病态人格和丑陋的国民性，试图唤醒国民的精神。他的小说一开始就站在展示人物整体人性的高度，从文化人格的广角来塑造人物，使中国现代小说人物的文化人格塑造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遗憾的是，鲁迅停止了小说创作，致使人格塑造的高峰轰然断裂。

**【关键词】** 鲁迅；人格塑造；高峰；断裂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0)03-0000-124

## 一、弃医从文的鲁迅：以小说为武器的斗士

新文化运动是以“文学革命”为发端的，而“文学革命”则是以小说的革命为先锋的。近代小说的兴盛，应归功于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对小说的看重。梁启超等维新派在变法维新中特别看重文学的宣传功能，而在强调各体文学为他们的政治运动服务时，特别注意到小说通俗易懂，便于口口相传、开通民智的特点。康有为就说过：“仅识字之人，又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

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sup>〔1〕</sup>特别是1898年9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政治变革失败后，梁启超把政治改良的希望寄托于文学尤其是小说上，他主张创作小说的目的在“振国民精神”，“把一国的人从睡梦中唤起来”。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明确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这场小说革新的运动，虽然是当

※ 本文为四川省社科“十一五规划”2007年度（自筹）课题

〔作者简介〕毛克强，宜宾学院教授；袁平，宜宾学院副教授，四川 宜宾 644000。

时政治的需要,但与后来的革命文学要求的政治不同,当时的小说着眼于国民的精神、灵魂乃至人格。正如梁启超说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sup>[2]</sup>梁启超寄托于小说无限的重任,直至人格的塑造。梁启超的小说“人道”的学说,无疑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1915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目标实际上是促进人的解放,胡适把它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因为文学革命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身:是“为了推动一种用人民的活语言的新文学去取代古典文学的有意识的运动”;“非常奇异的是,这场新的运动却是由那些懂得他们的文化遗产而且试图用新的现代历史批评和探索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遗产的人来领导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一场人文主义运动”<sup>[3]</sup>。

救亡必先启蒙,启蒙主义的人文思想,深远地影响到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们。胡适就对文学革命的新文化运动,在文化精神、文化传统方面赋予了“启蒙”的性质:“一场有意识的反抗传统文化中许多思想习俗的运动”,

“一场有意识的把个体的男女从传统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一场理性反对传统、自由反对权威、以及颂扬生活与人的价值与反抗对它们的压制的运动”。由于新文化运动的以上任务,因此胡适认为“文学革命”启蒙的目的就是“目标和前途就是一个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的再生”<sup>[4]</sup>。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大力倡导青年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觉察国家存亡的情势;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号召青年人要有政治的觉悟和伦理的觉悟;在《我之爱国主义》中呼吁:“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涌现出更多的“笃行自好之士”,才是“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者”。在文中他提出爱国青年的人格构成是要有勤、俭、廉、洁、诚、信的诸种品格。<sup>[5]</sup>早期的陈独秀,把救亡的希望寄托于有新思

想、新精神、新的人格构成的新青年身上。李大钊在1919年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指出了“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而“少年中国”的创造需要“少年运动”,而“少年运动”的开展,需要少年的精神,去开展“精神改造的运动”和“物质改造的运动”。“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sup>[6]</sup>文化先驱者们的启蒙与救亡的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至“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以反封建礼教、反封建文化,直至反帝、反封建专制为前奏的思想武器。

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改良主义的思想,特别是他们后期试图通过文学的武器,改良国民的精神的思想,对鲁迅的影响很大。当然给他以直接影响的,是鲁迅同时代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如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鲁迅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就在于他起点很高,执手文学一开始就站在对人性、国民性、国民精神的深度和高度,对民族文化人格的整体思考。许寿裳回忆鲁迅时说,他和鲁迅早在留学日本弘文学院的时候,就和他经常讨论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就是说早在鲁迅日本求学的青年时代,弃医从文以前,就在深刻和宏阔地关注国民精神的启蒙问题,就在思考如何医治和拯救国民性的病根。也即许寿裳说的:“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后来所以毅然决然放弃学医而从事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他知道即使不能骤然得到全部解决,也求于逐渐解决上有所贡献。因之,办杂志、译小说,主旨重在此;后半生的创作数百万言,主旨也重在此。”<sup>[7]</sup>茅盾先生也评价鲁迅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颂扬者,同时也是对国民性、民族性的拷问者。他认为:“鲁迅先生三十年功夫的努力,在我看来,除了其他重大的意义外,尚有一同样或许更重大的贡献,就是给三个相关联的问题开创了光辉的道路。”<sup>[8]</sup>

鲁迅留学日本,原本是为了通过学医,医治国人的病体,使国人强壮起来,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但在以上一些思想的影响下,他深刻认识到救国必先要唤醒的是民族的精神,强健的是国民的精神。

## 二、中国现代小说文化人格塑造的高峰

把手术刀换成了笔而握在手中的鲁迅,开始深入剖析国民的灵魂和劣根性。许寿裳先生说“对于国民性劣点的研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使我始终钦佩的原因之一。”<sup>[9]</sup>鲁迅一开始就把中国现代小说带到了一个制高点,从文化精神的高度来塑造民族被扭曲、被腐蚀、被吃掉的人性、灵魂与人格。而受鲁迅的影响以及启蒙主义和西方文化精神的影响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尽管很少,但也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现了对于文化人格的描写和塑造。这共同形成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拔地而起的高峰,高峰的顶尖是鲁迅的《阿Q正传》,根据大家的共识,在其人物的塑造上至今还没有一部小说能够超越它。

《狂人日记》的病态人格塑造,揭示了封建礼教吃掉的是民族的独立人格。

我们说中国现代小说起点很高,一开始就是从人物的人格塑造或刻画入手的,就是指的是《狂人日记》所描写的人物是一个精神迫害狂,而作者正是通过这个精神迫害狂来猛烈地抨击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文化。小说中的狂人,是个患迫害症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早在20世纪初就传播到了中国,这对鲁迅肯定产生了影响。从小说的人物塑造上鲁迅自己说过,受到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影响,但在人物的内容影响上却比果戈理的狂人深刻和广博。所以在狂人形象的精神病因上,弗洛伊德的精神病理学从人物的精神意识的深层次分析,显然对鲁迅有深刻的影响。鲁迅对人物的塑造告诉我们,中国现代小说一开篇就是从人物的精神意识层次的描写,从病态人格的塑造上开始的,所以是起点很高的。

精神分裂症中的迫害狂症,是由于恐惧引起的焦虑症。狂人恐惧死亡,恐惧被吃掉,因此引发精

神的焦虑,整日处在受迫害的惶恐焦虑中。是什么原因引起狂人对死亡的恐惧的焦虑?这才是我们阅读和分析狂人病态人格形象的意义所在。小说中写道:“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引起青年一代人格病态的原因,原来是封建文化中虚伪的仁义道德所包裹的吃人的本质。封建文化何以吃人?一是封建家族制度的礼教吃人,那就是“吃人的是我的哥哥”。哥哥在小说中,代表着封建家族的最高权力,中国习俗是长兄为父,所以哥哥其实是父权和皇权的象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就是封建社会制度和家族制度共同的吃人的礼制,所形成的专制文化,它吃掉了国人的独立人格和人的独立地位,吃掉了人的精神。第二是愚昧的人们,他们是吃人的帮凶,帮着哥哥们吃人。如小说中的赵贵翁、交头接耳的路人、说“咬你几口”的女人,还有老中医,“所以他们大家联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我认识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

狂人骨子里是清醒的,他恐惧被吃,周围都是吃人的眼;但他警醒人们:“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做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他还自省,被吃的人,也可能也吃了人,“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可见,狂人形象是间歇性的精神病患者,正是这些处在危险边缘的青年知识分子,鲁迅认为还有挽救的可能,于是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狂人形象反封建礼教的意旨,是大家都知道了。然而为什么鲁迅要塑造一个患迫害狂的精神病患者形象?而不仅仅是所谓的狂人性格特征?在于鲁迅的着眼点并不在于刻画出一个性格鲜明的狂人来,而在于通过对狂人病态人格的塑造,揭示出封建专制与封建礼教对民族人格的扭曲与戕害。

《阿Q正传》对丑陋的国民人格的塑造,尖锐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

《阿Q正传》是鲁迅弃医从文前就在思考的三大问题的文学形象的结晶,是他留学日本以来立志要用文学拯救国民精神,重塑国民性和国民人格的文学实践。所以鲁迅在小说的“序”中说,“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年了。”作品中的阿Q,是个连姓氏都没有的小人物,鲁迅却给他做“正传”,决不是游戏之笔,因为阿Q影射出的是国民劣性和民族丑陋的人格。所以鲁迅是在为我们民族和国民的负面做“正传”。早年鲁迅致力于理想人性的追求,他要找到国民劣根性的病因,重新塑造国民性与民族的人格,因此鲁迅的小说创作一开始就是把笔作为了手术刀,用以毫不留情地剖出毒瘤和脓疮来。茅盾在早年赞扬鲁迅“我看到了古往今来的若干伟大的Humanist中间的一个——鲁迅先生!”“古往今来的伟大的文化战士,一定也是伟大的Humanist;换言之,即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颂扬者。……正因为他们所追求而阐扬者,是‘最理想的人性’,所以他们不得不抨击一切摧残,毒害,蔽塞‘最理想人性’之发展的人为枷锁,——一切不合理的传统的典章文物。”<sup>[10]</sup>这就是鲁迅塑造阿Q形象的真实意图,也是他塑造人物的宏大视野的起点:从国民性和人格批判的高度来塑造人物。

人格是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和外在个性的构成整体,他包含着性格、能力、需求、情绪、动机、气质、意志、态度、世界观、价值观等身心要素。所以,以上阿Q的多种表现特征,就是他丑陋人格整体中多种要素的表现。阿Q的身份,是农村中的流氓无产者,相当于懒虫、无赖与泼皮。他的精神胜利法,表现为妄自尊大却又自轻自贱,外强中干,失败之后便只会退回内心,自我添舐伤口而通过诅咒他人获得满足。这是他精神和情绪上的病态,是精神病患者中的人格分裂症状的表现,他不敢正视现实中的失败,只能用幻想来获得补偿。这就是康克林在《变态心理学》中说的:“许多患心理病的人在过想象生活时发生一种自己觉得伟大的迷狂症,这就叫补偿作用。”他的争强好胜、好斗、霸道,然而一遇强者便忍辱屈从,具有奴性的懦弱与卑怯,则

是他的性格和意志的特征。质朴愚昧、率真任性和圆滑无赖,是他的气质的表现。狭隘保守、排斥异端和要造反,是他的动机和价值观的体现。他揪小尼姑的脸,要和吴妈睡觉,是他的需求的表现。他正统卫道,趋炎附势、盲目趋时,是他的世界观的作用。他的麻木健忘和安于现状,是他的对待现实的态度。所以,我们站在人格构成的高度,对人物整体塑造进行分析,就能梳理出人物形象在塑造中表现出的整体性和丰富性。

鲁迅先生早年对国人的丑陋人格是深恶痛绝的,在他的《百病缠身的中国人》等文章中,就反复的揭示、批判过中国人的劣根性:麻木、迷信、势利、卑怯、自大、好面子、好古、虚伪、懒惰、窃滑、保守、庸俗、自私、奴性等等。他写文章、写小说揭露国民的劣根性的目的,就是“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孔乙己》中对孔乙己之类的虚伪、懒惰、卑怯和死要面子,予以了毫不留情的批判。陈独秀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也是把救国的希望放在拯救国民性上,他认为“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我们中国人,天生有几种不好的性质,便是亡国的原因了。”<sup>[11]</sup>他批判的几种劣根性,就是不勤、不俭、不廉、不洁、不诚、无信。这些劣根性,孔乙己身上都有。他的价值观始终就是“劳心者治人”,穿着破长衫饿死也不肯学一点求生的劳动本领,只能作一只潦倒的寄生虫。他的动机和需求,都集中在虚无的科举功名上,以至于腐蚀了他的一生。他的意志和态度,已经被腐朽文化锈蚀得麻木和卑怯。鲁迅先生对孔乙己病态人格的塑造,深刻揭示了封建文化中的功名利禄对旧知识分子的扭曲,所以孔乙己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不可多得的人物。

《呐喊》中的小说,便是他的喊声:“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药》这篇小说,就是鲁迅的喊声之一。《药》中隐含着鲁迅对人们迷信中医偏方的讥讽,这是他散发父亲被偏方医死的情结。华老栓花了大价钱买刽子手康大叔的人血馒头,但根本没有医好华小栓的痼病,华小栓不久便

死去了。当然这是作品的表层，作品的深层是鲁迅对以华老栓为代表的人群愚昧、迷信、麻木、冥顽不化的看客人格的描写，以怒其不争、恨其不醒的呐喊，试图唤醒国民的麻木的灵魂。为了使自己的喊声不单是悲哀，“所以我往往不惜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以给麻木的人群一点希望的光明。鲁迅对看客人格的精神、心态和行为是非常鄙视乃至愤怒的，是促使他弃医从文的动因。《药》中以华老栓为代表的看客，对革命者的死，不但没有半点同情与惊觉，反而食其血、笑其疯、喊其好。鲁迅对他们的批判和哀怨，通过群体人格的刻画，力透纸背。鲁迅在一则《斗来斗去的中国人》中，也对看客人格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说中国人不仅爱窝里斗，还爱看别的东西斗，爱看自己们斗，看军阀们斗，但是就是不敢站起来与外来侵略者斗。

鲁迅的小说可以用深邃来评价，他的二十多篇现实题材的小说并没有宏大的题材，但他以小题材触及的是人的人格、精神和内心世界，深刻关注的是国民的人性和精神本质。他的《祝福》就是在关于人的灵魂的问答中，揭示了封建礼教对人格的毁灭，从文化人格塑造的层面批判了传统文化腐朽的一面。从小说的阅读中，我们感到祥林嫂是在争取一种独立的人格，从而获得做人的地位和生存权。虽然小说的很大篇幅是描写祥林嫂的坎坷与苦难的生活状态，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苦难并没有击垮祥林嫂。死了前夫，为躲避婆家的卖婚，逃到鲁镇帮工，被婆家抓回，卖到深山贺家，后夫害伤寒死去，儿子被狼咬死……历尽灾难的祥林嫂再次到鲁家，虽然境遇改变变得非常大，手脚已没有先前灵活，记性也坏了，逢人就她的儿子阿毛，但她并没有完全垮掉，还在坚强地支撑着。让她垮掉的，是封建礼教的氛围，因为她是不祥的女人，鲁四老爷家以往祭祀的饭菜、摆设都是祥林嫂一手操办，而今却一样也挨不上手。镇上的人也一天天对她冷淡起来，周围全是又冷又尖的嘴脸。再加上她听说人有魂灵，死后下到地狱里，她的前夫和后夫还要争她，阎罗王只得把她一锯两半。活着已经毫无人的

尊严和地位了，死去还要被阎罗锯成两半，这就让祥林嫂感到恐怖了。但她还在挣扎着，因为柳妈说只要到庙里捐了门槛，就可赎一世的罪名。于是她挣够了钱，到庙里捐了门槛，回来时“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但是冬至的祭祖再次给她打击，她连祭祀的酒杯和筷子也不能碰。“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只是一个木偶人。”沦为乞丐的祥林嫂，最终死在过年的爆竹声里。封建礼教吃掉了祥林嫂的灵魂，毁灭了她的人格，使她失去了做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和地位。所以祥林嫂失去的生存并不是衣食的生存，而是人格独立和精神层面的生存，因此《祝福》不仅是一篇描写苦难的小说。

鲁迅的文学观，一开始就是为民族为国家的文学，从来不是为文学而文学。他的小说所揭示和批判的国民性的弱点，所塑造和鞭答的前现代社会的病态人格，不仅仅是为了描绘丑陋的中国人的面相，而是不留情面地解剖了中国人的蒙昧和愚痴，虽然在当时阶级和民族斗争激烈的时代，并不是解救中国的主流道路，但为今天民族精神的革新和国民性的重塑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尤其是他总站在现代文学的潮头，从整体人格塑造的高度和深度来塑造人物形象，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优秀的典范。一些优秀的年轻作家，在鲁迅的影响下关注整体的人性和人格的塑造，虽然他们都英年早逝，但他们的作品也累积在鲁迅作品的周围，构成现代小说的峰峦。

萧红就是在鲁迅创作的直接影响下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她的小说在家乡沦为日本人的占领区的现实中，把对国民精神的展示与呼兰河畔人们的生死魂灵的揭示结合在一起，虽没有得到完美的结合，我们也从中看到了作者对人们蒙昧、卑贱的生存状态的愤怒和怜悯，如《生死场》中的金枝所说的，“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然而她的内心深处却是：“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

恨。”我们也看到了人们对生死的悲壮的觉悟，老赵三对人们说：“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奴……”作者对家乡人民整体精神的塑造，对人们生死灵魂的塑造，是她产生影响力的根本所在。

在现代小说作家中，郁达夫以描写变态性心理著称。人们注意到他40多篇小说中，有一半以上的作品写到了性以及变态的性行为，也有一半以上的作品描写了主人公的死亡。即性意识和死亡意识成为郁达夫小说描写的主题，是他挥之不去的情结。导致郁达夫这种主题情结的因素，任动先生分析是他的自卑心理，在创作中的宣泄和自我暴露，构成他的病态人格。要引伸的是，郁达夫的病态人格，影响了他在小说中对人物的病态人格的刻画。

“浓重的自卑心理已经成了郁达夫的病态人格，这种病态人格对创作的最大影响就是自我暴露，以自我暴露来求得自卑心理的某些补偿。”<sup>[12]</sup>在早期的作家中，由于受西方心理学的影响，特别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从人的精神、意识、心理的角度来刻画人物，即从病态人格的塑造来反映病态的社会生活，也是现代小说一开始就高于人物的性格刻画的一个方面。

我们感兴趣的是穆时英的创作与为人的矛盾，前期小说与后期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的矛盾。评论者们归结为穆时英的双重人格，这就是说，在早期现代文学发展中，穆时英自身人格发展和小说创作的实践，就给我们提供了今天研究现代文学史上文化人格塑造的样板。张勇在《逃离与奔向》中提出了穆时英二重人格的问题，认为他的二重人格源自于从“都市”到“市”的时代转变中分裂的精神情怀。吴祖辉《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说》中也说到穆时英的二重人格是现代社会产生的由多侧面的人格支配的人的特性，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化生成初期的人的生存本质。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穆时英早期创作中人物人格与现实中作家本人的人格之间的矛盾，即人格的二重特性。《南北极》中收录的作品，代表了穆时英的早期的创作，表现出的是蔑视富人，反叛权贵，仇恨水性杨花的女人，毁灭一切的流氓无产者

的人格形象。而作者描写这些人物的时候，只是一个20岁不到的大学生，生活在十里洋场的环境，尽管家境中落，但也不至于穷愁潦倒。一个柔弱的书生，何至于有愤世嫉俗、毁灭一切的人格？黄献文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认为：“穆时英曾说‘我是正，又是反；是是，又是不是；我是一个没有均衡，没有中间性的人。’正是这种二重人格使其创作走着两条不同的路径：《南北极》中的普罗文学，《公墓》以后的新感觉作品，它们从内容到形式都成了一个‘南北极’”。<sup>[13]</sup>在这篇文章中，黄献文先生从穆时英的家庭的衰败、世态的炎凉来分析了他的二重人格的产生。16岁以前的穆时英，家境富裕，因此宾客盈门，众多小姐家的媒人踏破门槛。而一旦家道中衰，众人作鸟兽散，穆时英目睹了社会贫穷的悬殊、不公和黑暗，经历了世态炎凉的现实，因此在年青的心中产生对社会、对女性的憎恨和报复心理。而现实中的穆时英是个柔弱书生、翩翩公子，是他作品中描绘的郑萍、潘鹤龄们，于是在他的意识深处虚拟出一个社会叛逆者的形象，就像小狮子、黑旋风们，塑造出无意识中的穆时英。的确，穆时英的早期的小说，都是以第一人称来写作的，他把自己化作了敢打抱不平的黑旋风、流氓无产者小狮子、江湖好汉，以及抗租暴动的农民。这就构成他作品中的虚拟人格，和现实中的真实人格形成鲜明的反差。

### 三、高峰的断裂：鲁迅为何停止小说创作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小说文化人格塑造的高峰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以上一些作家。但文化人格塑造的断裂，也是以鲁迅停止写小说为明显的分界。鲁迅首先是一个思想家，然后才是文学家，正是这样，他的人物塑造才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张旭东先生评价鲁迅的思想有一种哲学上的张力和创造性，而鲁迅本人以及他的文学创作，具有明晰单纯的思想特有的强度。他认为：“鲁迅笔下的许多表述、意象、语言、说法，给人思想上的震惊和文学上的紧张感，几乎是过去一百年来中国人唯一能拿出来和现代西方文学的高峰相提并论的东西。”“鲁迅的确是整个现代中国人集体精神史上最鲜明、最

有力的形象之一。这个形象在今天看来仍然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sup>[14]</sup> 张先生的评价也是当前公认的评价，尤其是在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所达到的社会深度和人性厚度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竖起了一个无人超越的高标。遗憾的是，在小说创作上，鲁迅从现实人性的塑造《呐喊》，转到借古讽今的《故事新编》后，就搁笔了。后人熟悉的鲁迅，就变成一个尖刻犀利的杂文家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奇峰突起的小说人物的文化人格塑造，转而被革命文学以及革命的疾风暴雨淹没了。

关于断裂的原因，可从几个方面思想。从鲁迅的文学主张以及对革命文学的选择来看，作为精神启蒙的代言人，鲁迅的文学主张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为人生、为民族、为国家的文学。从他弃医从文那天起，鲁迅就不是为文学而文学，而是“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所以鲁迅的小说，之所以深刻，也是因为战斗的呐喊，是为了惊醒昏睡的人们，毁坏使人昏睡的铁屋；“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使他不惮于前驱。”<sup>[15]</sup> 当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疾风暴雨卷过，当鲁迅用于呐喊的小说引起的震动的余波袅袅之后，鲁迅发现还有用文学为军阀护身的文人学士们，于是他要做个举着投枪的战士。但是小说作为投枪，毕竟太软弱了。在新文化运动过后的大革命年代里，疾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以及后来的民族斗争，使得鲁迅不得不从文学救国，转向寻求新的救民救国的道路。1930年，鲁迅参与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成为导师级的人物。作为纯文学的小说样式，很难起到在阶级斗争中的匕首与投枪的战斗作用了，所以杂文和短评成为鲁迅后期主要的写作样式。鲁迅的战斗精神，促使鲁迅向左转，从文学革命转向为革命文学，从而结束了他的小说创作。

鲁迅人格的伟大和深邃，使得他在大革命的年代不满于轻浮的“革命文学”，也是使他放弃小说创作的原因。鲁迅的老朋友许寿裳有一段话，对鲁迅的人格和精神以及情怀有着中肯的评价：“鲁迅

的人格和作品的伟大稍有识者都已知道，原无须多说。至于他之所以伟大，究竟本原何在？依我看，就在他的冷静和热烈双方都彻底。冷静则气宇深稳，明察万物；热烈则中心博爱，自任以天下之重。其实这二者是交相为用的。经过热烈的冷静，才是真冷静，也就是智；经过冷静的热烈，才是真热烈，也就是仁。鲁迅是仁智双修的人。为其智，所以顾视清高，观察深刻，能够揭破社会的黑暗，抉发民族的劣根性，这非有真冷静不能办到的；惟其仁，所以他的用心，全部照顾到那愁苦可怜的劳动社会的生活，描写得极其逼真，而且灵动有力。他的一支笔，从表面上看，有时好像是冷冰冰的，而其实是藏着极大的同情，字中有泪的。这非有真热烈不能办到的。”<sup>[16]</sup>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虽然思想倾向转向了共产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也参加了左翼文学活动，并指导着一些年轻的左翼作家，但对当时的一些左翼青年作家的创作，特别是革命加爱情的所谓“革命文学”，他是瞧不起的。鲁迅在致韦素园的信中，就批评到：“上海去年嚷了一阵革命文学，由我来看，那些作品，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观念的产物，有些简直是军阀脑子。今年大约要改嚷恋爱文学了，已有《惟爱丛书》和《爱经》预告出现，‘美的书店’（张竞生的）也又开张，恐怕要发生若干小Sanin罢，但自然仍挂革命家的招牌。”<sup>[17]</sup> 这样的一些革命加恋爱或简单鼓吹暴力的所谓“革命文学”，鲁迅先生当然是不会趋势的，他那善于从现实的小小题材中发掘深刻的人性和国民性的笔，由于已不合时髦，所以就搁笔。

从一些左翼作家对鲁迅小说的批判来看，鲁迅曾公开表示他对一些所谓左翼作家的创作的不满，一些左翼作家也对鲁迅的小说给予大肆的攻击。特别是对鲁迅的《呐喊》里面的作品，正如鲁迅自己说的：“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sup>[18]</sup> 上世纪30年代的鲁迅几乎处于论战当中，缘由是先是朋友或导师，后来却成了论敌。他把自己比作被别人用了即扔掉的梯子：“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

之外,也无几了。……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sup>[19]</sup>

一些左翼的批评家,对鲁迅的小说和创作予以尖刻的批评,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里,就认为“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是一个落伍者、隐遁者、说教人。<sup>[20]</sup>钱杏邨在《死去的阿Q时代》中,批评鲁迅的创作没有现代的意义,“他的大部分创作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他的小说是“滥废的无意义的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文学”,鲁迅作品反映出的只有怀疑和苦闷的思想,没有光明的前途。阿Q虽然代表了鲁迅创作的成绩,有它本身的地位,但是“阿Q的时代是早已死去了!”“就是鲁迅他自己也走到了尽头,再不彻底觉悟去找一条生路,也是无可救济了。”所以钱先生呼吁:“鲁迅先生,现在是醒来的时候了,朦胧的醉眼也到了睁开的时候了。要就死亡,要就新生,横在你面前的是这两条路。”<sup>[21]</sup>李初梨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中,对鲁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战斗精神进行了一一的抹杀,最后认为鲁迅是小资产阶级的“忠实的看家狗”,是小资产阶级的“最良的代言人”,是无产阶级的“最恶的煽动家!”<sup>[22]</sup>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更是对鲁迅的全面否定,“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蒂!”<sup>[23]</sup>一方面是,穷于论战的鲁迅,也许没有更多的时间静下心来写小说了;另一方面是,转向于左倾的鲁迅,他的小说却遭到了来自左翼阵线的强烈批判,于此而感到寒心了吧。鲁迅在1935年9月12日写给胡风的信中就表露了这种心境:“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用鞭子在背后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地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sup>[24]</sup>其实,鲁迅曾有过写长篇小说的打算,许寿裳就回忆过鲁迅先生曾有

三部长篇小说的构思,一部是想写杨贵妃的,已经收集了很多史料。也有人回忆说,鲁迅曾打算写一部反映中国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可惜始终没有动笔。鲁迅先生没有给中国文坛留下长篇小说,的确是个遗憾。但仅就他现存的小说,也已经给中国现代文学造就了高峰,只可惜他的停笔和一些后来者的英年早逝,现代文学史上的人格塑造的峰峦就此断裂!

鲁迅小说创作题材的枯竭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夏志清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也谈到过鲁迅曾经有写一部讽刺中国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的打算,但一直没有勇气下笔,除了以上的原因外,他创作力的衰竭也是一个主要因素。而创作力的衰竭在于鲁迅“他不能从自己的故乡以外的经验来滋养他的创作,这也是他的一个真正的缺点。”<sup>[25]</sup>确实,体现鲁迅创作成就的两个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人物、场景和故事,很多都是他家乡绍兴一带的。周作人有一本书,叫《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就是专门分析鲁迅小说里人物来源,以及故事所产生的场景的。比如祥林嫂,周作人说到:“祥林嫂的故事是用了好些成分合起来的……(原型)那是鲁迅的一个本家远房的伯母。”<sup>[26]</sup>书中还告诉我们,孔乙己本姓孟,当地人叫孟夫子,也是本家族见过的类似的人物;而狂人是鲁迅的表兄;阿Q本姓谢,他有一个哥哥叫谢阿有,如此等等。这就是说,鲁迅主要小说作品里的人物以及场景和事件,都是他青少年时代所生活和熟悉的故乡的生活。李长之说:“他的故事,惯于以农村为背景,而且在他的故事中,也往往以农村为背景的为最出色,在《孔乙己》、《明天》、《风波》、《社戏》、《祝福》几篇里,都明明标出地点是鲁镇,那咸亨酒店的境况,似乎我们一闭眼就可以呈现出来。”鲁迅是非常擅长于从故乡农村的题材中,发掘深刻和富有典型意义的小说内容的。“一旦他的农村的体验写完了,他就已经没有什么可写,所以他在1925年以后,便几乎没有创作了。”<sup>[27]</sup>李长之还认为,鲁迅的性格孤僻,不爱“群”,而爱孤独,但他以后一直生活在都市,由于他的性格融入不到

都市生活中去,体会不到都市生活,因此写不出使人满意的都市生活的小说。没有了生活之源泉,加之卷入到无休止的论战中,而对于所谓的“革命文

学”的彷徨,使得鲁迅在小说创作上既迷茫又精疲力竭,尽力凑出《故事新编》后,就默默地告别小说了。

---

#### 【参考文献】

- [1] [2]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下册[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513,515.
- [3] [4] 郝明工.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及流派[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80,79.
- [5] 陈独秀.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M].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
- [6] 李大钊.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M].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67.
- [7] [8] [9] [10] [16]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M].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112,113,7,112,10.
- [11]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M].三联书店,1984.53.
- [12] 任动.郁达夫的自卑心理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濮阳教育学院学报,2002,(2).
- [13] 黄献文.论穆时英创作的“南北极”倾向[J].中国文学研究,2005,(3).
- [14] 张旭东,姜异新.让鲁迅的文本自己说话[J].新华文摘,2009,(12).
- [15]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9, 441.
- [17]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二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60.
- [18] [19] 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53,227.
- [20] [21] [22] [23]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M].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8,46-61,88-89,126.
- [24] [25]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9,34.
- [26] 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193.
- [27] 李长之.鲁迅批判[M].北京出版社,2006.4、142.

---

(责任编辑 苏 宁)